

一、概 述

相信对国内各学科领域来说，“世界古代前期”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此，在起笔之前，有必要事先阐明我们这部《世界古代前期文学史》所涵盖的时间断限和空间地域。

1. 世界古代前期文学的内涵

我们所说的“世界古代前期文学”，从物质生产发展水平方面来看，大体上指铁器时代以前诸时期的文学；从社会形态的演变方面来看，指原始社会及早期奴隶制社会时期的文学。从理论上讲，“世界古代前期文学”在地域上的覆盖面是世界范围的，但由于世界历史发展在局部时间内的不平衡性，在以上物质生产发展和社会形态演变两个标准的界定下，这一概念所包括的空间地域实际上只有我们通常所称的“四大文明古国”，即巴比伦（实际上应是整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和印度。换句话说，只有这四个地区和国家的文学发展及所取得的成就才值得称道，才有资格被载入史册。即便是四大文明古国，其迈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也存在差异，因此对其早期文学也不可能在时间上简单划一，那样做是欠科学的，而应视各地区和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时间从公元前 4000 年代至公元前

538年新巴比伦王国灭亡；古埃及从公元前4000年代至新王国时期结束（公元前1085年）；古印度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中国从远古至周代及春秋前期（公元前6世纪）。

从以上地域范围来看，我们所说的世界古代前期文学实际上只包括古代东方文学。这一点很有意义。因为长期以来，不仅是在文学界，甚至包括整个文化领域，存在着一种欧洲或西方中心论的论调，认为东方国家的文学不行，甚至完全忽视东方文学的成就、价值和影响。对此，我国从事东方文化尤其是东方文学研究的学者们一直在以孜孜不倦研究的实际行动，向人们展示东方文化和文学的卓越成就，来抵抗这种不良的倾向。我国著名东方学家季羨林教授在其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的前言中，就一语道出了这种不良倾向的危害性。实际上，文化尤其是文学领域内的欧洲或西方中心论是缺乏根据的，如果稍微懂得或尊重一点历史事实的话，就不能不承认，人类最早的文明与文化起源于东方，东方许多古代民族在文明和文化的创造方面大开人类之先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在古代两河流域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及建设城市之时，欧洲大陆还处于蛮荒状态；当古埃及人不仅为所崇拜之神大兴土木建造庙宇，而且已经懂得为自己死后修建雄伟、豪华的居所——金字塔时，欧洲人的祖先尚四处漂荡，没有找到适合的长久生存之地。东方的文化和文学成就有的得以保存，多数则湮没不彰，但无论是流传至今的，还是后来遗失的，都对世界文化和文学，包括欧洲文化和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对比而言，西方文明和文化起步较晚，其发展自然是受到了要早得多的东方文明和文化的影响，继承了其诸多的文化遗产。美国著名文学史家S. N. 克莱默博士就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西方文明或者说欧美文明与其说源

于克里特、古希腊和古罗马，不如说源于古代近东，源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现代西方学者所著的西方文明史几乎都包括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在内，而且还置于篇首，这无疑说明，西方学者已普遍接受了克莱默教授的观点，把古代近东的文明纳入自己的文明体系之中。季羨林教授把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归并为四大文化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波斯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包括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在内）、欧洲文化体系^①。这四大文化体系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看到，在这四个独立体系中，东方占了三个，而且形成较早，西方只有一个，而且形成较晚。

西方中心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既有历史的根源，也不乏现实的基础。从历史上看，中国近代的学者和有识之士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需求出发，一改封闭的陋习，不断地介绍西方文化，使中国开始了解西方，这无疑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而在近代相对落后的东方，其文化也就没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在现实方面，随着新形势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文化和思潮大量涌入，造成一些入盲目地崇拜西方，认为西方什么都好，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的荒谬主张。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古代东方文学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在四大文明古国之中，除了对我们中国自己的古代文学之研究较为深入、全面外，其他只有以季羨林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印度古代文学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这两片文学沃土，还有待于全面挖掘。本书则重

^① 参见季羨林主编《简明东方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绪论，第5—8页。

点介绍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的文学成就，由于篇幅所限，还只能择其扼要。如果它能或多或少地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抵制西方中心论的影响，那我们将喜不自胜。

2. 历史与文化背景

世界古代前期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远的文化沉积作为其土壤，无论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人，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人，还是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汉民族、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印度雅利安人，其文学都是它们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的孕育物。

早在旧石器时代，两河流域就有人居住，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这一时期的洞穴遗址。迄今所知这一地区最早的民族是欧贝德人，公元前 5000 年时，他们已定居于此，并且建立了村落，修建了规模宏伟、构造复杂的神庙。至公元前 4000 年时，他们的影响已遍及整个近东。公元前 3500 年左右，苏美尔人来到两河流域南部，主要居住在苏美尔地区，他们说苏美尔语。苏美尔人发展农业、建设城市，并且在艺术、建筑、社会组织、宗教思想和宗教生活乃至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成为人类最初城市文明的真正创造者。在文化方面，他们发明了人类最早的文字——苏美尔语，创立了最早的学校，它们成为其文明和文化传播的有力工具。比苏美尔人稍后，塞姆人的东支阿卡德人来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以北的阿卡德地区，亚述人则进入了北部的亚述地区。阿卡德人的势力不断壮大，最后趁苏美尔诸城内部混战之机，一举征服了苏美尔地区，实现了两河流域的初步统一。阿卡德人吸收了苏美尔人的文化成就，甚至保存了其宗

教传统,发展了自己的语言,把两河流域的文明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随后入主两河流域南部的是居于阿卡德王国东北札格罗斯山中的古提人。他们约于公元前 2255 年侵入巴比伦尼亚,征服了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古提人统治的具体情况不详,因为他们没有留下文字资料。把两河流域南部文明推向极盛的是阿摩利人。公元前 1894 年,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巴比伦,并逐渐发展壮大。其第六代王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古巴比伦王国达到极盛,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古巴比伦王国灭亡后,加喜特人和迦勒底人先后统治这一地区。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文明也在发展。亚述人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了庞大的军队,至公元前 10 世纪时,亚述帝国开始呈现出生机。亚述人的文化虽受南部巴比伦人影响较大,但已形成自己的特色。亚述的统治者虽多依赖于武力,但也比较注重文化,其末代王亚述巴尼拔所建之图书馆,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亚述帝国灭亡后,迦勒底人在南部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 6 世纪,兴起于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最终把两河流域纳入自己的版图。波斯人吸收了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一些优秀文化传统,并把它们传向了世界。

埃及也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约在公元前 6000 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地区之一。公元前 4000 年代前期的涅伽达文化 I 时期,埃及处于金石并用时代,氏族制处于解体时期。在涅伽达文化 I 时期,埃及出现了若干个小国家。早王朝时期(第 1—2 王朝)埃及实现了统一,社会经济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古王国时期,埃及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金字塔的修建既体现了古埃及国家的强盛,又反映了埃及工匠建筑技术的高超。中王国时期埃及处于

青铜时代的奴隶制盛世，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王权得到了加强。随后埃及处于喜克索斯人的统治之下，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新王国时期，埃及步入了帝国。在公元前 2000 年代下半叶，其版图北达叙利亚北部，南至尼罗河第四瀑布。新王国以后，埃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后来并入波斯帝国版图。波斯帝国对传播古埃及文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古代印度在旧石器时代也已有居民。大约在公元前 4000 年代末至公元前 3000 年代初，在西北部的印度河盆地由金石并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迄今所知印度的土著居民为达罗毗荼人，他们从公元前 3000 年代起在次大陆占居重要地位。公元前 2000 年代中叶，讲印欧语的雅利安人从中亚来到南亚次大陆。雅利安人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定居下来，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国家。雅利安人国家的形成过程也是其征服土著居民的过程，在这过程中还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种姓制度，即瓦尔那制度。

中国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初期，这时期生活着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等。约公元前 5000—前 3000 年，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在约公元前 2800—前 2000 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母系社会开始转入父系社会。古华夏族的四大族源——姜姓炎帝族、姬姓黄帝族、东夷族和苗蛮族开始向中原聚集。他们在互相斗争中不断融合，不仅产生了古华夏族，还促进了国家的形成。公元前 21 世纪，中国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出现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公元前 17 世纪，商族建立了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代创造了优秀的青铜文化，首次出现了文学。其舞乐、文学甚至史学都已达到了相应的水平。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8 世纪末，中国进入了西周时期。这时期，不仅生产继续发展，还形成崭新的文化——礼乐文化。在这种新的社会结

构和文化氛围下，文学艺术空前繁荣。

3. 独特的体裁和内容

由于世界古代前期是人类文明的童年期，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在体裁方面还是在内容上都表现出与后来的文学极不相同的独特性。

神话传说。神话是原始人的集体创造，每个部族或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这是因为在人类的童年，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十分低下，对自然力和自然现象尚缺乏理解能力。这便是神话产生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神话都是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也就是说，神话只能产生于人们尚不能科学认识以至于支配自然力的时代，在文明较发达的理性社会是不会有神话的。我们无意在此探讨神话学的一些理论问题，纵观世界古代民族的神话，便会发现他们的神话从素材到内容存在着许多令人感兴趣的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些创世神话表明他们对宇宙世界的理解既相通又有差异；他们都有洪水神话，苏美尔巴比伦人的大洪水的故事，埃及的洪水传说，中国的大禹治水等等，其中苏美尔巴比伦的洪水神话对《圣经》中的洪水故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史诗文学。史诗文学产生于人类由野蛮向文明社会迈进的时期，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一个需要英雄而产生了英雄的时代，因此是产生歌颂英雄的文学的时代。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人类史上第一部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此外还有《恩美尔卡史诗》和《卢伽尔班达史诗》。这三位

英雄都是乌鲁克城邦之王，可能在乌鲁克国家形成过程中功勋显赫。在中国，商族有歌颂商族先祖的五部史诗，周人也有歌颂其先王开国创业之伟绩的五部史诗。在印度稍晚些时候，出现了两部著名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不过不在本书涉及范围之内。史诗文学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某些真实的历史过程。

赞颂诗和祈祷词。古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宗教和拜神活动紧密相关的，赞颂诗与祈祷词便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赞颂诗的内容主要是赞美天地众神及其神在人间的代理者——国王；赞美大自然，主要包括万物生命之源——太阳和养育当地人民的名川大山；赞颂宏伟的人工建筑等等。祈祷词的主要内容是乞求神灵赐予人们幸福及死后升入天堂。赞颂诗和祈祷词这两种形式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及古印度都比较发达，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民族的原始宗教观念和生活习俗。

教谕文学。教谕文学可以简单地说成是说教文学，是以教育人或预言事为主要目的的。这种文学形式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并且也是在这两个地区最为发达，尤其在古埃及。古埃及产生了不少教谕文学的名篇，如《普塔霍特普之教谕》、《对美里卡拉王之教谕》及《阿尼教谕》等。这些教谕文学作品一般采取先哲预言、父亲教育儿子、国王告诫王子等形式，人物虽系真实，但一般并非真正出自其手笔，多为后人假托之作，因此称得上有目的的创作的文学作品。其内容涉及面较广，既包括常人的为人处世之道、礼仪规矩及一些社会问题，也包括国王治理国家的统治策略，或称为王之道。因此，教谕文学能较为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精神风貌、社会价值观及伦理道德观等。

寓言及谚语。寓言与谚语严格说来也应属于教谕文学之范围，因为其教育意义或功能十分明显。它也是人们有意识地创作的精神产品，其目的是表达一种思想以教育人们或启发人们。最早的寓言产生于苏美尔，而不是像西方传统上所认为的那样是公元前6世纪的《伊索寓言》。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的寓言比《伊索寓言》要早一二千年之久。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寓言可谓丰富多彩，既包括动植物寓言，也包括物品寓言，还包括自然现象寓言。著名的有《狐狸的故事》、《牛与马》、《骑驴的故事》、《怪树与椰枣树》、《柳树的故事》、《牲畜与谷物的争论》、《冬与夏的争论》、《铜与银的争论》及《锄与犁的争论》等。古埃及人的寓言产生要晚一些，也略为逊色一些，故本书未收入。谚语是人们对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世界上各民族都有反映其对所生活环境的真实感受的谚语或格言。最早的谚语同样产生于苏美尔。苏美尔人的谚语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苏美尔人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理解和感受，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念。

以上体裁是世界古代文学独具特色的，但不是唯一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代中国和古印度都产生了其他许多更具文学特色的文学体裁和作品，例如，诗歌、散文故事（小说的雏形）及人物传记等，它们当中有的在文学性和思想性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这一时期的文学体裁及其所反映的内容表现出了一些与后来的纯文学不相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大体上可概括如下：

其一，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环境造就了一些后来文学中不复存在的独特的文学体裁。

其二，纯文学作品较少，多为熔文、史、哲及宗教作品于一炉，因此思想性较强，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其三,作品中包含着深远的文化内涵,直接体现着各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

其四,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这是因为多数体裁的作品之产生是与宗教仪式和拜神祭祀活动紧密相关的。

4. 世界古代前期文学的历史地位

古代前期是人类社会的童年,是世界文明与文化的发生和开拓期。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方面自然在这一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把产生、发展成熟直至定型的民族精神及文化传统真实地记录下来,使之成为民族发展与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柱。

从纯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讲,这时期的文学成为后来文学发展的重要源泉。这时期产生了人类最早的文字、最早的诗歌、最早的史诗、最早的人物传记、最早的散文故事(短篇小说的雏形)及最早的寓言、谚语等等。这时期的文学对后世的文学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是不容抹杀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的文学对后来的波斯人、希伯来人、阿拉伯人乃至欧洲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印度的文学对周围的国家和民族影响较大,对阿拉伯人和欧洲也产生了影响。

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学

一提起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学，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那部著名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确，这部流芳百世的文学名著足以令苏美尔—巴比伦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然而这一事实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遗憾，甚至可以说是悲哀，即浩繁的、极具价值的苏美尔—巴比伦文学作品都被一部《吉尔伽美什》史诗夺去了应有的光彩，以致长期湮没不彰。这样的局面是令人尴尬的；除了一部《吉尔伽美什》史诗，人们对苏美尔—巴比伦文学再也说不出许多了。正如著名的苏美尔学家 S. N. 克莱默教授所反复中肯地指出的，“本世纪人类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是发现、恢复、翻译和注解了大量的苏美尔文学文献”。不算巴比伦文学作品，仅苏美尔文学目前就有二十余部神话，每部篇幅从 100 行到 1000 行不等；九部史诗，每部的篇幅在 100 行至 600 行左右；一百多首赞美诗，每首篇幅也在 100 行至 500 行左右；十几部格言和预言集；此外还有大量的哀歌、寓言故事及辩论和短文等^①。这些苏美尔文学作品刻写在 5000 多块泥板上，这些泥板遍及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博物馆。因此，苏美尔—巴比伦文学绝不仅仅是一部《吉尔伽美什》史诗，它还有

^① 参见 S. N. 克莱默《历史始于苏美尔》(S. N. Kramer, History begins at Sumer), 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289 页。

许多动人的神话、许多其它不朽的史诗、许多感情充沛的诗篇及充满智慧的谚语、预言、格言和寓言故事等，这些都是人类文学宝库的宝贵遗产。

1. 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如同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一样，在文字产生以前，苏美尔人的文学可能就已经存在了，那便是口头文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便产生了文学创作，在最古的苏美尔城市的文书库中所发现的文学作品，便证明了这一点^①。但在古苏美尔时期，几乎未发现什么文学资料，这时期的文学可能大部分仍停留口头上，人们还未感到有把它们记录下来的必要^②。在塞姆人的阿卡德王朝衰落后，大量的文学作品才涌现出来。乌尔第三王朝即所谓的新苏美尔时期及随后的伊新一拉尔萨时期，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学的第一个繁荣期。这一时期的大量的文学作品被保存下来，但它们之中多数不是该时期的“原作”，而是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的抄本，内容和体裁主要包括赞美诗、书信、法典片断和文学争论等。每部作品都刻有清楚的创作日期，也正是从巴比伦第一王朝的这些抄本中，大量的传统的苏美尔文学才得以恢复。尼普尔是苏美尔书吏学校的中心，因此也是其文化中心。这里的学者成为苏美尔文学思想的保护者，在从古巴比伦时期尼普尔城发现的大量文献中，苏美尔文文书占有压倒优势

^① 阿雷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22 页。

^② 参见 W. G. 兰伯特《巴比伦智慧文学》(W. G. Lambert, Babylonian Wisdom Literature)，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 页。

的比例,这可能要归功于他们的努力。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学发展的第二个繁荣期,也是巴比伦文学的第一个繁荣期,无疑是古巴比伦时期,确切地说,是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虽然巴比伦文学吸收了苏美尔文学的许多成就和思想,但“一些确实的材料表明,巴比伦文学兴起于苏美尔传统文化影响以外的地区”^①,从迪亚拉河流域的泰尔·哈尔马尔^②遗址出土的泥板文书,与在尼普尔发现的同时代泥板文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泰尔·哈尔马尔出土的文学作品中,苏美尔语和巴比伦语的泥板大约占有同等的数量,此外还有许多同时用两种语言刻写的泥板。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古巴比伦文学明显地没有形成自己的中心。迪亚拉地区以自己的方言进行创作,马里和巴比伦城也如此。在古亚述时期,到卡帕多西亚殖民的亚述商人则以古亚述方言记述文献。因此,巴比伦文学具有强烈的和浓重的地方色彩和传统。巴比伦文学的起步应该说不算太晚,遗憾的是关于其起源和早期发展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当巴比伦文学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其作品和思想都已显示出成熟性和经验性,可以肯定,在此之前它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古巴比伦人的文学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不断地抄写古苏美尔文献,往往附有阿卡德文译文,同时不断编纂新的苏美尔文文献;其二,用巴比伦人自己的方言进行文学创作。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学的第三个繁荣期,也是巴比伦文学的第二个和最后一个繁荣期是喀西特王朝时期。同样遗憾的是,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情况所知甚少。喀西特人虽然也属于

① W·G·兰伯特,《巴比伦智慧文学》,第9页。

② 泰尔·哈尔马尔(Tell Harmal),即古代的沙杜普姆(Shaduppum)。

“蛮族”范畴，但他们并没有带来严重的破坏，也没有造成文化的中断。相反，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似乎具有较明显的“复古”倾向和维护传统的倾向。它们表现出了继承传统和发扬传统的双重性。在继承传统方面，喀西特人主要从事的是转写和编辑此前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存在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一份目录，记载的是一系列的文学作品，每一作品都注明是“依据”某一特定城市的编辑者。在很多情况下，一部作品往往有许多种“版本”，可能系出自不同城市的学者之手。在发扬传统方面，他们主要的做法是改写以往的作品。根据某位学者的看法^①，喀西特人倾向于生活在过去，但缺乏早先作品的激情和灵感。这一点甚至在语言方面也很明显。这一时期的方言是中巴比伦语，它是由古巴比伦语发展而来的，但一般在文学中不被采用。喀西特人创造了一个所谓的“标准巴比伦语”，这种语言只用作文学创作和其它书面语言，而从来不作口语使用。奇特的是，这种所谓的“标准巴比伦语”的一些发音特征在词法学上比古巴比伦语还古老。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文体风格上也如此。

在喀西特王朝时期以后，新创作的文学作品数量不很多，而且除个别的例外，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2. 苏美尔和阿卡德神话

根据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宇宙观，人间世界和天上世界是相对应的，地上有的东西，天上也同样都有。居住在天上的神大多被人格化了，并且具有自然属性，如天神、地神、水神、大气

^① 参见 W. G. 兰伯特《巴比伦智慧文学》，第 14 页。

神和风神等。苏美尔和巴比伦神话涉及的内容包括世界的构成、宇宙的创造和人的创造,以及诸神的喜怒哀乐,和平与战争等。这些神话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还是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宗教和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要在这样一部著作中把所有苏美尔和巴比伦神话逐一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只好有选择地进行叙述和阐释。

(1) 恩奇与宁胡尔萨格——天堂神话

苏美尔文学对希伯来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有关天堂的神话中。在苏美尔人的天堂中,生活着神而不是人,具体地说是水神和智慧之神恩奇(巴比伦人称为埃阿)和众神之母宁胡尔萨格(亦称宁马赫)。在《恩奇与宁胡尔萨格》^①神话中,苏美尔神的天堂称为底尔蒙。底尔蒙被描绘为“洁净”、“无秽”和“光明”的境域,为“生者的境域”,从不知有疾病和死亡。但底尔蒙缺乏淡水,而淡水又是动植物的生命源泉,因此水神和智慧之神恩奇便命令太阳神乌图把淡水从地上引到底尔蒙,使底尔蒙成为田野富饶、草场丰美的神园。在这个神的天堂里,水神和智慧之神恩奇与苏美尔众神之母(就起源而论,似为地母)宁胡尔萨格女神结了婚,宁胡尔萨格经过九天的怀胎后,未经分娩的痛苦,生下了女神宁穆。恩奇很快又使他的女儿宁穆怀孕,她以与其母宁胡尔萨格同样的方式,生下了女神宁库拉。接着恩奇又使宁库拉怀孕,并生下女神乌特图。当恩奇又想使乌特图怀孕时,宁胡尔萨格出面干预。宁胡尔萨格向乌特图提出了一些劝告,劝

^① 英译本见 J. B. 普里查德编《古代近东文献》(J. B. Pritchard, ed., *Ancient Near East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普林斯顿 1969 年版, 第 37—41 页。

告的具体内容泥板未能保存下来,但根据后面的内容可以判断出来。乌特图被劝说不要与恩奇同居,除非恩奇送给她黄瓜、苹果和葡萄等礼物。但这些礼物对水神恩奇来说并非难事,他满足了乌特图的要求,乌特图芳心大悦,遂与恩奇同居。但这一结合并未生出新的女神,似乎是宁胡尔萨格利用恩奇的精子创造了八种植物。当恩奇发现这八种植物时,可能系出于决定它们命运的目的,必须品尝它们。于是他的信使双面神伊西穆德为他采摘了八种植物,恩奇一一地吃下。此举激怒了宁胡尔萨格,她对恩奇说了句咒语后便离去,并声称,除非他死,否则她是不会再用“生命之眼”来看他的。恩奇的身体每况愈下,他身上八个器官无不处于病态。恩奇的病情使众神十分悲伤及至痛不欲生。众神立即召开众神会议商讨此事,众神之王恩利尔竟也一时束手无策。这时雌狐主动请缨,她对恩利尔说,如果众神给予应有的犒赏,她,雌狐,可使宁胡尔萨格去而复返。对于雌狐是采取何种手段请回宁胡尔萨格的,泥板的相应部分被毁。宁胡尔萨格返回后,使恩奇得以康复,她让他坐在身旁,询问他身体八种器官带给他何种厄难后,创造了相应的八神以对之。于是,恩奇转危为安。

克莱默教授把苏美尔的天堂与《圣经》中的天堂及故事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圣经》中的天堂故事源于苏美尔^①。首先,两个天堂的位置可能相同。苏美尔的天堂在底尔蒙^②,后来的巴比伦人也把它视为他们的“生者境域”以及永生者所在地。据此可以推知:被描述为位于东方的伊甸园,并成为

① 参见塞·诺·克莱默编《世界古代神话》,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2—83页;S. N. 克莱默《历史始于苏美尔》,第141—144页。

② 底尔蒙(Dilmun),今巴林。

四条“世界大河”(包括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地的《圣经》中的天堂,颇有可能与苏美尔的天堂同源。其次,对太阳神以淡水灌溉底尔蒙的描述,也与《圣经》中有关情节相似。众女神的生育没有经受折磨,无分娩之苦,恰与加之于夏娃的诅咒“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相对应。恩奇食八种植物并因此遭受诅咒,显然是亚当和夏娃食知善恶树的果实并因这一罪行而遭诅咒这一情节的原型。克莱默教授对此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于,他把《圣经》中有关天堂记述的一个最令人费解的情节,根据苏美尔的天堂神话作了圆满的解释。这一情节是:“一切活物之母”夏娃是以亚当的肋骨造成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用肋骨而不是身体的其它部位来创造女人呢?据《圣经》所述,“夏娃”其名似乎意即“给予生命者”。据苏美尔神话所述,恩奇最薄弱的部位为肋骨。苏美尔语中“肋骨”一词音“提”。为治愈恩奇的肋骨所造之神,苏美尔人称之为“宁一提”,意即“肋骨女性”。而苏美尔语中的“提”,又有“创造生命”、“给予生命”之意。由此可见,此神之名“宁一提”似乎又有“给予生命的女人”之意。因此,在苏美尔文学典籍中,往往把“肋骨女人”与“给予生命的女人”相等同。正是这一文学双关语被移用于《圣经》中,并长久保存下来。这一问题如果仅仅依据《圣经》本身,显然无法解释得通,因为在犹太人的语言中,表示“肋骨”与“给予生命者”的两个词,毫无共同之处。

(2)大洪水的故事

《圣经》中的洪水故事,其实并不是希伯来人的创造,而是来源于苏美尔神话。记载苏美尔洪水神话的泥板损坏严重,只有最后三栏内容不完全地保存下来,因此无法知道神话开始讲的是什么。值得一提的是,该神话不仅讲述一个大洪水的故事,还反